

隔代抚养与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微观证据与机制分解*

王伟同 陈琳

摘要：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已成为决定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 和 2015 年三期调查数据，分析了中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拥有 16 岁及以下孙辈的中老年群体中，隔代抚养行为有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抚养强度和中老年群体年龄的增长而减弱，65 岁以上群体并没有通过隔代抚养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子女异地居住的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不能通过隔代抚养行为得以提升，这意味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不利于改善中老年人生活质量。机制分析表明，中老年人孤独感的降低、与子女联系频率和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增加是其生活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机制分解发现孤独感降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隔代抚养 中老年生活质量 抚养强度

中图分类号：F061.4

JEL：J20

一、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于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说，生活质量是养老生活中追寻的重要目标（Ng, 1996），影响着中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有研究表明提升中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不仅有助于该群体预防心理疾病、改善身心健康状况进而降低医保压力，而且有助于维系中老年群体与子女孙辈的代际关系，促进家庭和睦，减少社会矛盾。根据《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人达到 2.4 亿，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17.3%，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人达到 1.58 亿，占全国人口的 11.4%，预计到 2025 年，我国将成为超老年型国家。面对规模日益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如何提高该群体的生活质量对当下中国而言意义十分重大。

隔代抚养孙辈是中国传统家庭抚育的重要方式，也是祖父母与子女孙辈代际关系传递的重要纽带（Chen, 2011），影响着中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中老年群体选择照看孙辈的重要目的是帮助子女缓解工作压力，这客观上增加了子女的工作时间，特别是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有效供给（García-Morán & Kuehn, 2017；邹红等，2018）。而在中国退休年龄普遍较早的背景下，父辈也有更多精力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进行隔代抚养（何圆、王伊攀，2015），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的经济压力，降低了子女的养育成本。另一方面，隔代抚养也作为一种家庭间的代际交换条件存在，中老年群体通过照看孙辈可以获得子女在精神或物质方面的支持，子女的养老行为也会随之增加。因此隔代抚养是父辈与子辈的共同需要，也是家庭代际关系传承的重要方式，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子女劳

*王伟同，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116025，电子邮箱：wangweitong99@sina.com；陈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16025，电子邮箱：chenlin_dufe@126.com。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口迁移决策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实证测度、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71973020）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制度研究”（71833002）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动供给、降低子女养育成本进而缓解中国人口红利衰减的压力，也能够改善中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进而降低社会医疗保障压力。在此基础上，如果隔代抚养能够进一步提高中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则意味着隔代抚养行为还可以通过提高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来增加社会总体福利，提升居民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这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针对隔代抚养对中老年群体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集中探讨了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影响，关于隔代抚养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或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重点研究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探讨这种影响效应在不同中老年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和内在影响机制。对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老年人隔代抚养孙辈行为、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还能够为今后老龄人口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实证研究了中老年隔代抚养行为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隔代抚养行为可能有利于提高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抚养强度和中老年群体年龄的增长而衰弱，6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并没有通过隔代抚养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与子女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中老年群体，无法从隔代抚养孙辈中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机制分析表明，中老年人孤独感的降低、与子女联系频率和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增加是其生活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机制分解发现孤独感降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隔代抚养行为如何影响中老年群体的探讨是从研究抚养行为对中老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抑郁程度、认知功能的影响逐渐转变为研究对中老年人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研究过程伴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理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身心健康状况作为影响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早期对隔代抚养行为的研究中最先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且与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等方面的研究相互交织渗透。部分文献首先探讨了隔代抚养对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的影响。这部分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文献认为隔代抚养对中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中 Minkler & Fuller-Thomson（1999）发现美国家庭中照料孙辈者比未照料者，在身体功能障碍、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和健康满意度方面更差。Lee et al（2003）针对中老年女性群体的研究发现，向孙辈提供高水平护理的行为可能增加妇女患冠心病的风险。这类研究多从高强度的隔代抚养行为出发，认为较高强度照料孙辈会使中老年群体承受较大的身体压力，繁琐重复的照料工作使祖辈推迟了自身的医疗需求，影响了祖辈的正常社交活动（肖雅勤，2017），从而有损身心健康进而降低了中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另一类文献集中探讨了隔代抚养对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的正面影响，认为抚养行为有利于祖辈的身心健康及认知功能，间接提高了祖辈生活质量。其中，国内学者宋璐等（2008）研究发现为儿子提供孙子女照料会给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带来的正面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体系下强烈的“儿子偏好”及“社区情理”文化心理观念导致祖辈更乐意为家族后代多做贡献，在尽到照料责任的同时，也尽享儿孙之乐。国外学者 Di Gessa et al（2016）针对欧洲地区老年人研究发现，在控制老年人早年的身体健康、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后，提供孙辈照料有助于提高祖母的健康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子女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家庭支持，反向促进了祖父母对自身健康的关注。Arpino & Bordone（2014）将是否有孙辈作为是否照料孙子女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照料儿童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持更好的语言交流能力，提高自身健康行为水平。总体来看，国内学者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祖辈自身获得感、

与子女情感交流等方面来解释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的正面影响，而国外祖父母对照料孙辈的责任意识通常较弱，隔代抚养孙辈对于国外祖父母来说往往只是对子女直接照料的补充，且主要通过子女提供有形支持、规范自身健康行为、获得子女情感肯定等方面间接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中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加关注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影响。从异质性角度来看，Grundy et al (2012) 基于对智利的中老年群体研究发现，每周为孙子提供 4 小时及以上帮助的祖父其两年后的生活质量更高，祖母生活质量变化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绝大多数家务和照料责任，容易产生劳累和情感压力，而男性并不是传统上的抚养者角色，即使参与照料活动也往往由其配偶分担。靳小怡、刘妍璐 (2017) 采用 2013 年深圳市 P 区和 2015 年河南省 Y 县的专项调查数据中的 356 个样本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对非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有正向影响作用，对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存在非线性的“倒 U 型”关系。这是因为非流动老人无需面对迁移所带来的社会适应问题，照料孙子女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生活满意度，而流动老人虽然通过照看孙辈减少了孤独感，但也缺少了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入的机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从隔代抚养影响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原因机制来看，有研究表明与配偶或儿童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患孤独和抑郁的风险更小，孤独感作为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体现可能是隔代抚养孙辈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机制之一。Leder et al (2007) 研究发现长时间、高压下的照料对照料者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但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解这种负面影响。周晶、韩央迪 (2016) 研究发现对于提供持续性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而言，情感支持在照料经历对其自陈健康状况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吴培材 (2018) 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对女性中老年人和农村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更大，且主要通过增加中老年人的社会交际、锻炼次数和从子女处获得的净转移支付来实现，该研究以中老年人从所有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作为机制变量的衡量标准，可能会削弱代际交换的解释力，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关注。

已有文献关于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影响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特点，一是已有文献更多关注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而对中老年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二是已有文献对隔代抚养影响中老年生活质量内在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尤其是关于各种影响机制的重要程度缺乏有效探讨；三是已有研究大多缺乏有效的因果识别框架，没有考虑隔代抚养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有研究使用了是否有孙辈作为隔代抚养行为的工具变量，但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的文献价值在于，一是本文将重点聚焦于隔代抚养对中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探究了隔代抚养这种传统家庭抚育模式如何影响中老年生活质量；二是系统研究了隔代抚养影响中老年生活质量的内在机制，分别从情感渠道和经济渠道两个方面研究隔代抚养影响生活质量的内在机制，并通过机制分解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机制的重要程度；三是分别利用 OLS、有序 Probit、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等多种估计方法进行了稳健性估计，尽可能保障了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 研究设计

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对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指标 (崔红志, 2015)，本文拟采用生活满意度作为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代理变量。由于我们重点关注的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是有序离散型变量，一般需要采用有序 Probit 方法进行估计，该

模型是 Probit 模型的扩展，专门处理被解释变量是有序离散型数据的情况，在已有文献中已得到广泛的使用。与此同时本文还将采用 OLS 估计方法估计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原因在于大样本情况下使用 OLS 和有序 Probit 两种方法所估计的结果没有差异，且 OLS 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直观更具有经济意义，不少国内研究也采用 OLS 方法来估计各种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何立新、潘春阳，2011；陈钊等，2012；连玉君等，2014）。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ife\ Satisfacti\ on_i = \alpha + \beta Grandchildren_i + \gamma Z_i + T_i + \Pi_p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ife Sstisfaction_i* 代表第 *i* 个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Grandchildren_i* 表示受访者 *i* 是否进行隔代抚养、隔代抚养孙辈数量及其二次项、隔代抚养孙辈的周数；*Z_i* 表示受访者 *i* 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T_i*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Π_p 表示省份虚拟变量， ε_i 是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时变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后系数 β 值的大小和方向。

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因模型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其核心思想在于寻找一个影响隔代抚养行为但不会直接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变量。本文选择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受访者平均隔代抚养率作为是否隔代抚养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Sajaia，2008）进行估计，其中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利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和蒙特卡洛模型方法估计出的结果相较于两步估计法和 2SLS 更优，且该方法在已有研究文献（Russo，2012；Hyll & Schneider，2013；王海成、郭敏，2015）中得到了认可和使用。

在稳健性分析部分本文将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匹配变量包括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和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寻找的工具变量，匹配方法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在机制分解中以最近邻匹配法（ $K=4$ ）为基准结果，使用回归调整法（Rubin，1979）对由于隔代抚养行为带来的生活满意度净增加值进行分解，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分解可以较好的控制其他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净效应的影响，以考察不同中介机制变量在隔代抚养影响生活满意度中的重要程度。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该调查的调查对象为中国 45 岁以上中老年人，覆盖 28 个省份、150 个县级单位，450 个村级单位，约 1 万户家庭中的 1.7 万人。本文选择使用该数据库 2011、2013、2015 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剔除了没有 16 岁以下孙辈且年龄大于 85 岁的样本，最终得到了 9025 个有效样本。

被解释变量为“中老年人生活质量”，选择“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作为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代理变量，调查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受访者回答有五个选项：一点也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和极其满意，分别赋值为 1-5。核心解释变量“是否隔代抚养”，调查问卷只对拥有 16 岁及以下孙辈的受访者进行提问“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外）孙子孙女？”受访者回答是或否。抚养强度变量包括隔代抚养孙辈数量和隔代抚养孙辈周数。在机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选取孤独感变量作为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度量，问卷对于“我感到孤独”设立了四个选项，很少或根本没有，赋值为 1，不太多赋值为 2，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赋值为 3，大多数时间赋值为 4；选取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作为子女对中老年人情感支持的度量，联系方式包括电话和短信等，取值为 1-10；选取获得已婚子女经济帮助作为子女对中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度量，如果受访者有多名已婚子女，则取多名已婚子女的中位数。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一系列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水平、是否参与闲暇活动、是否退休、

是否有城镇户籍和是否居住在城市^①，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是否与子女同住、子女数量、已婚子女数量、家庭年支出和是否请家政服务。考虑到隔代抚养孙辈的时变因素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差异，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值为 3.140，介于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之间，这说明中老年群体整体上具有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其中隔代抚养组的生活满意度均值显著高于未隔代抚养组。具体来看，隔代抚养孙辈群体占比 53%，隔代抚养孙辈的平均数量为 1 个。从机制变量来看，隔代抚养组的整体孤独感程度更低，整体与子女联系的频率更高，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更多。从控制变量来看，隔代抚养组的女性占比更高，年龄偏低、已婚占比更高、受教育水平更高、自评身体健康状况更好、参加闲暇活动占比更高、城市户籍和居住在城市占比更高、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更高且家庭年支出更高。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全样本					隔代抚养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	否	T-test
							均值	均值	均值差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	9025	3.140	0.748	1	5	3.172	3.103	0.07***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隔代抚养	9025	0.530	0.499	0	1	1	0	1
	隔代抚养孙辈数量	9025	0.639	0.696	0	3	1.206	0	1.21***
	隔代抚养孙辈周数	9025	1.732	1.907	0	5.565	3.266	0	3.27***
机制变量	孤独感	8950	1.496	0.936	1	4	1.426	1.576	-0.15***
	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	7045	4.377	2.363	1	10	4.092	4.650	-0.56***
	获得已婚子女的经济支持	8475	4.161	3.339	0	12.83	4.414	3.891	0.52***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9025	0.498	0.500	0	1	0.488	0.509	-0.02**
	年龄	9025	60.88	8.447	45	85	59.27	62.69	-3.43***
	婚姻状况	9025	0.789	0.408	0	1	0.819	0.755	0.06***
	受教育水平	9025	1.083	0.809	0	3	1.137	1.023	0.11***
	自评身体健康状况	9025	2.491	1.026	1	5	2.521	2.457	0.06***
	是否参与闲暇活动	9025	0.570	0.495	0	1	0.604	0.531	0.07***
	是否退休	9025	0.422	0.494	0	1	0.391	0.456	-0.06**
	是否有城镇户籍	9025	0.179	0.383	0	1	0.187	0.169	0.02**
家庭特	是否居住在城市	9025	0.354	0.478	0	1	0.383	0.322	0.06***
	是否与子女同住	9025	0.423	0.494	0	1	0.484	0.353	0.13***

①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大部分个体特征变量均按照标准处理方式从数据库中获取。关于对个体是否退休的判定，CHARLS 问卷中认定城市退休人口以办理从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退休手续（包括提前退休和内退）为标准，农村劳动人口未在此列，因而本文以开始领取农村养老金为标准定义农村人口的退休状态，并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对退休与户籍的交互项进行控制，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征变量	子女数量	9025	3.072	1.468	1	11	2.819	3.357	-0.54***
	已婚子女数量	9025	2.599	1.400	0	10	2.418	2.803	-0.39***
	家庭年支出	9025	8.305	1.467	0.693	12.06	8.479	8.108	0.37***
	是否请家政服务	9025	0.010	0.098	0	1	0.006	0.014	-0.01***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分别使用是否隔代抚养、隔代抚养孙辈数量及其二次项和隔代抚养孙辈周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以考察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回归过程中分别控制了个体及家庭特征并加入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分别使用 OLS 和有序 Probit 两种方法，相应结果由表 2 给出。表 2 第 (1) 列结果显示，隔代抚养孙辈对中老年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且在 1% 水平下显著，隔代抚养行为提高了生活满意度 0.063 个单位，这意味着隔代抚养行为平均提高了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2.23 个百分点，对于全国数亿中老年人口规模看，平均 2.23 个百分点的生活满意度增加，对全国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是非常显著和重要的。第 (3) 列结果显示，隔代抚养孙辈数量在 1% 显著性水平上对中老年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隔代抚养孙辈数量每增加 1 名，生活满意度水平提升 0.080 个单位，但隔代抚养孙辈数量的二次项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说明随着抚养孙辈数量的增加，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现出先递增再递减的倒 U 型特征。第 (5) 列结果显示，隔代抚养孙辈周数对中老年生活满意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隔代抚养孙辈的时间每增加 1%，生活满意度将增加 0.046 个单位。表 2 中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总体上看，隔代抚养行为显著提高了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随着照料孙辈数量的增加，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现出先递增再递减的倒 U 型特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OLS	有序 Probit	OLS	有序 Probit	OLS	有序 Probit
是否隔代抚养	0.063*** (0.016)	0.097*** (0.025)				
隔代抚养孙辈数量			0.080*** (0.026)	0.119*** (0.041)		
隔代抚养孙辈数量二次项			-0.021* (0.012)	-0.030 (0.019)		
隔代抚养孙辈周数					0.046** (0.023)	0.067* (0.036)
性别	0.033** (0.016)	0.049* (0.025)	0.033** (0.016)	0.049* (0.025)	0.036** (0.016)	0.054** (0.025)
年龄	-0.022* (0.012)	-0.033* (0.018)	-0.022* (0.012)	-0.033* (0.018)	-0.021* (0.012)	-0.031* (0.018)
年龄的平方	0.021** (0.009)	0.032** (0.015)	0.022** (0.009)	0.032** (0.015)	0.020** (0.009)	0.031** (0.015)

婚姻状况	0.041** (0.020)	0.061* (0.032)	0.042** (0.020)	0.061* (0.032)	0.041** (0.020)	0.061* (0.032)
受教育水平	-0.006 (0.011)	-0.011 (0.017)	-0.006 (0.011)	-0.011 (0.017)	-0.005 (0.011)	-0.011 (0.017)
自评身体健康状况	0.155*** (0.008)	0.244*** (0.012)	0.155*** (0.008)	0.244*** (0.012)	0.155*** (0.008)	0.244*** (0.012)
是否参与闲暇活动	0.062*** (0.016)	0.096*** (0.025)	0.062*** (0.016)	0.096*** (0.025)	0.063*** (0.016)	0.098*** (0.025)
是否退休	0.047** (0.021)	0.074** (0.034)	0.047** (0.021)	0.074** (0.034)	0.047** (0.021)	0.073** (0.034)
是否为城镇户籍	-0.004 (0.037)	-0.007 (0.057)	-0.004 (0.037)	-0.006 (0.057)	-0.004 (0.037)	-0.006 (0.057)
退休×户籍	-0.058 (0.043)	-0.094 (0.067)	-0.059 (0.043)	-0.094 (0.067)	-0.058 (0.043)	-0.094 (0.067)
是否居住在城市	0.045** (0.019)	0.072** (0.029)	0.045** (0.019)	0.072** (0.029)	0.045** (0.019)	0.072** (0.029)
是否与子女同住	0.001 (0.017)	0.001 (0.026)	0.001 (0.017)	0.001 (0.026)	0.002 (0.017)	0.002 (0.026)
子女数量	-0.040*** (0.011)	-0.061*** (0.016)	-0.040*** (0.011)	-0.061*** (0.016)	-0.041*** (0.011)	-0.062*** (0.016)
已婚子女数量	0.069*** (0.012)	0.106*** (0.018)	0.068*** (0.012)	0.106*** (0.018)	0.069*** (0.012)	0.107*** (0.018)
家庭年支出	0.013** (0.005)	0.022** (0.008)	0.013** (0.005)	0.022** (0.008)	0.013** (0.005)	0.022** (0.008)
是否请家政服务	0.097 (0.072)	0.147 (0.113)	0.098 (0.072)	0.149 (0.114)	0.098 (0.072)	0.150 (0.114)
年份、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025	9,025	9,025	9,025	9,025	9,025
Pseudo R2	0.102	0.050	0.102	0.050	0.101	0.050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二) 异质性分析

随着中老年群体年龄的增长，抚养行为是否会对不同年龄阶段中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不同的影响，为此本文构造了基准回归中三个核心解释变量与年龄的交互项，并进一步根据年龄将中老年群体划分为 45 岁-55 岁、55 岁-65 岁、65 岁以上三个群体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3 和表 4 (A) 所示，三个隔代抚养变量与年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加，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将会逐步降低。从分组回归的情况看，在 45 岁-55 岁群体中，隔代抚养行为对其生活满意度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55 岁-65 岁群体中，隔代抚养行为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开始衰减；在 65 岁以上群体中，隔代抚养行为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是 45 岁-65 岁中老年群体刚刚进入老年阶段，身体机能相较于 65 岁以上中老年人更好，因而子女对其日常生活的关心可能较少，而隔代抚养行为在此时恰好充当了祖辈与

子女日常互动交流的中介，抚养孙辈减轻了祖辈的孤独感，获得了已婚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二是 65 岁以上群体各方面身体机能相对较差，此时子女认为父母在 65 岁之后身体机能逐渐衰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增加对父母的关心与支持，子女的这种关心和支持通常是一种自发主动的行为，因而不需要更多的需要隔代抚养这一行为作为沟通子女与父辈之间的桥梁。

表 3 加入年龄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OLS	有序 Probit	OLS	有序 Probit	OLS	有序 Probit
是否隔代抚养	0.477*** (0.118)	0.760*** (0.185)				
是否隔代抚养 ×年龄	-0.007*** (0.002)	-0.011*** (0.003)				
隔代抚养孙辈 数量			0.322*** (0.090)	0.523*** (0.141)		
隔代抚养孙辈 数量×年龄			-0.005*** (0.001)	-0.008*** (0.002)		
隔代抚养孙辈 周数					0.155*** (0.032)	0.247*** (0.050)
隔代抚养孙辈 周数×年龄					-0.002*** (0.001)	-0.004*** (0.001)
样本量	9,025	9,025	9,025	9,025	9,025	9,025
Pseudo R2	0.103	0.050	0.102	0.050	0.103	0.050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中已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时间虚拟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表 4、表 5、表 6、表 8 注释与此相同。

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代际关系是通过抚养和赡养的交换以形成代际间的平衡，这种反馈模式在中国的家庭中非常普遍，隔代抚养孙辈既体现了祖父母对家庭成员的关怀与支持，也是祖父母与子女保持代际联系的纽带。已有研究表明中老年人与儿孙共同居住的多代同堂模式有效缓解了中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提高了生活满意度（沈可等，2013）。鉴于此，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会受到子女居住地距离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按照子女居住地距离将中老年群体划分为三组：一是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或同一个社区，二是与子女居住在同一个市区的其他社区，三是与子女不居住在同一地区。表 4 第（1）-（4）列结果显示，隔代抚养孙辈对中老年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或同市区的中老年群体通过隔代抚养孙辈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第（5）-（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如果受访者与子女没有居住在同一地区，则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于那些距离子女居住地较远（跨省或国外）的中老年群体可能并没有从隔代抚养行为中获高的生活满意度，比如农村地区青年夫妇通常跨城市、跨省份外出打工将子女留给家中老人独自照看，在这种情况下独自照看孙辈可能会加剧中老年人的心理负担和身体负担，而且由于子女居住地距离较远导致中老年群体可能并不能及时获得子女的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从而未能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表 4 按年龄、子女居住地距离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A)	(1)	(2)	(3)	(4)	(5)	(6)
-----	-----	-----	-----	-----	-----	-----

	OLS	有序 Probit	OLS	有序 Probit	OLS	有序 Probit
	45<=年龄<=55		55<年龄<=65		年龄>65	
是否隔代抚养	0.111*** (0.031)	0.175*** (0.048)	0.076*** (0.024)	0.117*** (0.038)	-0.014 (0.032)	-0.025 (0.050)
样本量	2,487	2,487	4,048	4,048	2,490	2,490
Pseudo R2	0.128	0.062	0.107	0.053	0.098	0.048
(B)	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或同一个社区/村		与子女居住在同一个县/市/区的其他社区/村		跨省或国外	
是否隔代抚养	0.062*** (0.022)	0.099*** (0.036)	0.095*** (0.031)	0.145*** (0.048)	0.020 (0.035)	0.027 (0.053)
样本量	4,621	4,621	2,400	2,400	2,004	2,004
Pseudo R2	0.108	0.054	0.123	0.060	0.111	0.053

(三) 机制分析

已有实证研究给出了一些隔代抚养孙辈影响祖父母身心健康的作用机制，比如照料孙辈增加了中老年人的社会交际、锻炼次数和从子女处获得的净转移支付（吴培材，2018），提高了农村地区子女对中老年人的情感支持等（周晶、韩央迪，2016）。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老年人的精神孤独问题非常严重，对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慰藉严重不足。相关研究表明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中老年群体通常都会表现出寂寞、无助和郁闷等负面情绪，此时增加子女对退休后父母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有助于改善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Poterba，2014）。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可能是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机制。

本文为识别并检验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两种渠道的存在，引入了三个机制变量，分别是反映中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孤独感变量，反映与子女情感联系程度的与已婚子女联系密切程度变量，以及反映代际经济支持程度的已婚子女经济支持变量。首先将机制变量对隔代抚养变量做回归，检验隔代抚养行为对三个机制变量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是否隔代抚养在 1%显著性水平上抑制了孤独感的产生，显著缩短了中老年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中老年人从已婚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其次，分别将孤独感变量、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变量和获得已婚子女经济支持变量逐步放入基准回归。估计系数变化结果如表 6 所示，是否隔代抚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由 0.063 依次降低为 0.048、0.041、0.037 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整体下降了约 41.27%。第（5）-（8）列使用同样的方法在剔除年龄大于 65 岁的样本中对机制变量进行识别，回归系数值整体下降了约 38.20%。

表 5 隔代抚养孙辈对孤独感、子女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的影响（OLS 模型）

	(1)	(2)	(3)	(4)	(5)	(6)
	全样本			剔除年龄大于 65 岁样本		
	孤独感	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	获得已婚子女的经济支持	孤独感	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	获得已婚子女的经济支持
是否隔代抚养	-0.096*** (0.020)	-0.255*** (0.055)	0.418*** (0.070)	-0.104*** (0.023)	-0.273*** (0.064)	0.343*** (0.084)
样本量	8,950	7,045	8,475	6,499	4,903	6,033
Pseudo R2	0.116	0.141	0.176	0.119	0.089	0.190

表 6 逐步回归结果 (OLS 模型)

	(1)	(2)	(3)	(4)	(5)	(6)	(7)	(8)
	全样本				剔除年龄大于 65 岁样本			
是否隔代 抚养	0.063*** (0.016)	0.048*** (0.016)	0.041** (0.018)	0.037** (0.018)	0.089*** (0.019)	0.072*** (0.018)	0.058*** (0.021)	0.055*** (0.021)
孤独感		-0.159** * (0.009)	-0.164** * (0.010)	-0.164** * (0.010)		-0.166** * (0.012)	-0.168** * (0.013)	-0.168** * (0.013)
与已婚子女 联系的时间 间隔			-0.020** * (0.004)	-0.018** * (0.004)			-0.023** * (0.005)	-0.020** * (0.005)
获得已婚 子女的经济 支持				0.012*** (0.003)				0.012*** (0.003)
样本量	9,025	8,950	6,982	6,953	6,535	6,499	4,871	4,851
Pseudo R2	0.102	0.137	0.142	0.144	0.110	0.147	0.152	0.154

本文进一步使用 Karlson et al (2013) 提出的 KHB 方法对三种机制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是指核心解释变量通过机制变量的中介作用而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直接效应可以理解为核心解释变量不通过其他任何变量而直接作用于因变量的效应，表 7 报告了 KHB 方法的检验结果。如表 7 (1) (3) 列结果所示，OLS 和有序 Probit 两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孤独感、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和获得已婚子女的经济支持的中介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孤独感、代际情感支持和代际经济支持是隔代抚养行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显著路径，隔代抚养通过缓解中老年人的孤独感、增加已婚子女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进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 7 (2) (4) 列计算了两种模型中三个机制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其中孤独感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比约 30%，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 6%和 8%。OLS 模型和有序 Probit 模型下是否隔代抚养对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为 45.23%和 46.11%，这说明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近 45%的影响效应是通过孤独感、获得已婚子女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传导的。

表 7 基于 KHB 方法的三种机制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1)	(2)	(3)	(4)
			OLS		有序 Probit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 总效应 (%)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 总效应 (%)
生活满意度	是否隔代抚养	孤独感	0.021*** (0.004)	30.63	0.032*** (0.006)	31.12
		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	0.004*** (0.001)	6.34	0.007*** (0.002)	6.42
		获得已婚子女的经济支持	0.006*** (0.002)	8.26	0.009*** (0.003)	8.58

注:OLS 模型下是否隔代抚养对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为 0.031,直接效应为 0.037,总效应为 0.06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45.23%;

五、稳健性分析与机制分解

（一）内生性讨论

尽管在前文研究中已尽可能地控制了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因素，但仍然有一些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是我们无法观测的。因而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已有学者经常将子女性别、子女工作类型、是否有孙辈作为隔代抚养的工具变量，但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区别与以往研究，已有研究所选工具变量并不适用于本文。为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陈前恒等（2014），王伟同、魏胜广（2017）以及尹志超、张诚（2019）选取工具变量的方法，选择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受访者平均隔代抚养率作为是否隔代抚养的工具变量。选取如下三个年龄段，分别是 45-60 岁、60-75 岁、75-85 岁，样本共包含 447 个不同的社区。使用该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是同社区、同年龄段的中老年群体在隔代抚养孙辈行为上具有共同的偏好，中老年群体在隔代抚养决策中容易受到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中老年人的影响，如果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中老年群体隔代抚养的平均水平偏高，那么受访者进行隔代抚养的概率越大，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二是由于剔除了受访者自身是否隔代抚养的信息，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中老年人平均隔代抚养率不会直接影响受访者自身的生活满意度，避免了其与扰动项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三是此类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在许多文献中被广泛使用，并取得了较好的估计效果。因而本文选择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受访者平均隔代抚养率作为是否隔代抚养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为此，我们计算了每位受访者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受访者平均隔代抚养率作为是否隔代抚养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从表 8 的估计结果看，第（1）列 2SLS 的第 1 阶段中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受访者平均隔代抚养率对是否隔代抚养的影响显著为正且 F 值较大，符合前文分析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对比前文 OLS、有序 Probit 和 2SLS 的估计结果来看，2SLS 第 2 阶段估计系数值相较于前两种方法估计系数值偏大，但符号方向和基本结论没有变化。表 8（3）（4）列给出了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内生性检验辅助参数 $atanarho$ 的估计系数为 -0.113 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因而可以拒绝是否隔代抚养变量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第 1 阶段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受访者平均隔代抚养率对隔代抚养的影响显著为正，第 2 阶段在控制了内生性后，是否隔代抚养对生活满意度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之前关于隔代抚养行为正向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结论依然存在，说明本文之前的结论是可信的。

表 8 考虑内生性的 2SLS 估计和双变量有序 Probit 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2SLS		双变量有序 Probit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是否隔代抚养		0.306* (0.174)		0.274** (0.122)
同社区、同年龄段其他受访者平均隔代抚养率	0.211*** (0.024)		1.150*** (0.059)	
第一阶段 F 值	75.63			
$atanarho$			-0.113* (0.065)	

样本量	8,858	8,858	8,858	8,858
-----	-------	-------	-------	-------

(二) 倾向得分匹配

在基准回归结果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已有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匹配协变量包括基准回归中的个体及家庭特征等所有控制变量和本文寻找的工具变量，使用 Logit 模型得到倾向得分区间为[0.004, 0.896]，满足倾向得分匹配的共同支撑假设。匹配前后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Pseudo-R^2$ 值从匹配前的 0.085 下降到匹配后的 0.001；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由匹配前 19.2 下降到 1.3-2.0 之间，总偏误被降低；似然比检验的 P 值表明，协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在匹配前为统计显著，在匹配后各种匹配方法下 P 值均变大，原假设被拒绝。因此就平衡两组样本之间协变量的分布而言，倾向得分 Logit 估计和样本匹配是成功的。

表 9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1)	(2)	(3)
	$Pseudo-R^2$	LR 统计量 (P 值)	标准化偏差
匹配前	0.085	1038.22 (0.000)	19.2
最近邻匹配 (K=4)	0.002	21.26 (0.215)	1.6
最近邻匹配 (K=8)	0.001	14.47 (0.490)	2.0
半径匹配 (K=4 R=0.03)	0.001	14.26 (0.506)	1.5
半径匹配 (K=8 R=0.01)	0.001	14.96 (0.454)	1.7
核匹配 (二次核, 带宽=0.06)	0.001	15.68 (0.546)	1.3

注：半径匹配中 K=4、K=8 两种情况下匹配半径的计算结果为： $0.25\hat{\sigma}_{pscore} \approx 0.04156$ ； $0.125\hat{\sigma}_{pscore} \approx 0.0208$ 。

隔代抚养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和中介机制变量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ATT) 结果如表 10 所示，不同匹配方法下生活满意度的 ATT 值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平均值为 0.071，即隔代抚养组的生活满意度比未隔代抚养组高 0.071 个单位，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隔代抚养对孤独感变量、与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变量的 ATT 值在不同匹配方法下和 1% 的水平上均显著为负，平均值为 -0.089 和 -0.237，这表明隔代抚养组的孤独感和与子女联系时间间隔比未隔代抚养组在平均水平上低 0.089 和 0.237 个单位，与表 5 第 (1) (2) 列的结果基本一致；隔代抚养对获得已婚子女经济支持变量的 ATT 值在各种匹配方法下显著为正，平均值为 0.493。本文同样对剔除年龄大于 65 岁的样本进行匹配，匹配结果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鉴于篇幅原因不再进行汇报。

表 10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被解释变量和机制变量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ATT 值

结果变量	(1)	(2)	(4)	(5)	(6)	(7)
	最近邻匹配 (K=4)	最近邻匹配 (K=8)	半径匹配 (K=4 R=0.03)	半径匹配 (K=8 R=0.01)	核匹配 (二次核带宽=0.06)	均值
生活满意度	0.074*** (0.026)	0.072*** (0.019)	0.068*** (0.017)	0.070*** (0.019)	0.069*** (0.017)	0.071
孤独感	-0.090*** (0.026)	-0.089*** (0.023)	-0.088*** (0.022)	-0.093*** (0.023)	-0.088*** (0.021)	-0.089
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	-0.231*** (0.073)	-0.245*** (0.072)	-0.236*** (0.053)	-0.234*** (0.063)	-0.240*** (0.056)	-0.237

获得已婚子女的经济支持	0.513*** (0.098)	0.506*** (0.087)	0.485*** (0.088)	0.477*** (0.081)	0.488*** (0.078)	0.493
-------------	---------------------	---------------------	---------------------	---------------------	---------------------	-------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自助标准误（重复抽样 100 次）。

（三）机制分解

为进一步探究中介机制变量在解释隔代抚养孙辈提高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的贡献率，本文在匹配过程中加入工具变量作为新增匹配变量，以最近邻匹配法（K=4）为基准结果，使用回归调整法（Rubin, 1979）对由于隔代抚养行为带来的生活满意度净增加值进行分解，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分解可以较好的控制其他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净效应的影响，以考察不同中介机制变量在隔代抚养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的重要程度。

具体分解过程如下，首先保留完成最近邻匹配法（K=4）之后的所有处理组样本，计算匹配结果变量在隔代抚养组与控制组成员之间的差值 $\Delta y_i = y_{1i} - y_{0i}$ ，该差值代表受访者 i 进行隔代抚养的生活满意度净增加值。其次计算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决定变量在隔代抚养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值，记为 $\Delta Z_i = Z_{1i} - Z_{0i}$ ，该差值是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净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具体包括孤独感差值、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差值和获得已婚子女经济支持差值。根据倾向得分匹配“准实验”的思想，同一个受访者在两次不同的实验处理下产生不同的结果，受隔代抚养行为影响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变量在隔代抚养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值应显著不为零，而那些生活满意度的非决定性变量，如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的差值应显著为零。由于这部分使用的数据是通过最近邻匹配法（K=4）得到的，因而在公式（2）中无需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只保留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变量 ΔZ_i ，构建 Δy_i 对受隔代抚养影响的生活满意度决定变量 ΔZ_i 的回归方程，计算各分量对生活满意度净增加值的贡献率，分解方程的具体形式由式（2）给出：

$$\Delta y_i = \theta_0 + \theta_1 \Delta loneliness_i + \theta_2 \Delta child_contact_i + \theta_3 \Delta \ln(gainjzci_i) + \xi_i \quad (2)$$

其中 Δy_i 为受访者 i 生活满意度的净增加值， $\Delta loneliness_i$ 为受访者 i 孤独感的差值， $\Delta child_contact_i$ 为受访者 i 与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差值， $\Delta \ln(gainjzci_i)$ 为受访者 i 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取对数后的差值， ξ_i 为随机扰动项。方程（2）的加权 OLS 估计结果由表 11 的第（1）列给出；第（2）列是基于最近邻匹配法（K=4）计算的各中介机制变量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第（3）列净生活满意度效应来源由系数估计值乘以与其对应的 ATT 值得到，代表由中介机制变量变化引起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变化；第（4）列通过计算净生活满意度效应来源除以生活满意度净增加值得出各机制变量的贡献率。

表 11 隔代抚养孙辈提高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分解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系数估计值	ATT 值	净生活满意度效应来源	贡献率	贡献率	贡献率
孤独感差值	-0.147*** (0.014)	-0.090*** (0.026)	0.013	17.568%	6.667%	29.032%
与已婚子女联系的时间间隔差值	-0.016*** (0.006)	-0.231*** (0.073)	0.004	5.405%	1.111%	12.903%
获得已婚子女经济支持差值	0.019*** (0.004)	0.513*** (0.098)	0.010	13.514%	6.667%	19.355%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第（1）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第（2）列括号内为自助标准误（重复抽样 100 次）。全样本中生活满意度增加的净效应为 0.074，男性为 0.090、女性为 0.062。

表 11 第（4）列结果显示，全样本中孤独感变量、子女情感支持变量和经济支持变量分别贡献了 17.568%、5.405%和 13.514%，孤独感的贡献率最高，在解释隔代抚养提高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中发挥的机制作用更大，该结论与前文 KHB 方法中介效应检验的结论基本一致。为探究中介机制作用大小的性别差异，本文使用同样的方式分别计算男性和女性中介机制变量的贡献率，结果如表 11（5）（6）列所示，相比较男性群体，女性群体的孤独感，获得子女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在隔代抚养提高生活满意度中发挥了更大的中介机制作用。在我国中老年群体精神孤独状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孙辈首先缓解了中老年群体的孤独感，有效改善了中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其次，隔代抚养行为增加了中老年人与子女联系的机会，孙辈成为祖辈与子女沟通交流的纽带。除情感支持，已婚子女经济支持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中介机制作用，已有研究认为，子女经济支持作为代际支持的一种方式有助于放大隔代抚养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程度（王萍、李树苗，2011），本文结论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相比较男性群体，女性群体由于性格特征和社会经济分工等原因，通常表现出对家庭和亲人的依赖，因而本文中介机制因素在解释隔代抚养行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时，在女性群体中发挥了更大的机制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隔代抚养孙辈行为对我国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探讨了这种影响效应在不同中老年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和内在影响机制。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一是对于拥有 16 岁以下孙辈的中老年群体，隔代抚养行为对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随着隔代抚养孙辈强度的增加，生活质量可能会降低。二是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会随着中老年群体年龄的增长而衰弱，65 岁以上中老年群体并没有通过隔代抚养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同时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或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中老年群体，从隔代抚养孙辈中获得了更高的生活质量。三是机制分析表明，中老年人孤独感的降低、获得已婚子女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的增加是其生活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机制分解发现孤独感降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机制。四是从三种机制变量的重要程度看，隔代抚养更多通过降低中老年孤独感来实现，同时女性选择隔代抚养孙辈相比男性而言，会更多通过降低孤独感和提高与子女联系频率等情感途径获得生活质量的提升。

本文结论政策含义是，隔代抚养行为作为一种中国家庭传统抚育方式，能够从情感和经济两个层面有效提高中老年人幸福感，但随着育龄女性生育年龄推迟和未来退休延迟政策的实施，中老年人隔代抚养孙辈的年龄会进一步推迟，这导致隔代抚养行为对中老年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相对下降，也不利于传统隔代抚养方式的持续和家庭代际关系的传递，需要相关社会政策加以关注。同时由于户籍以及住房政策限制，中老年群体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都会降低隔代抚养行为带来的幸福感，因此应当出台政策尽力减少留守儿童现象，不仅有助于改善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也有助于提升中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陈前恒 林海 吕之望，2014：《村庄民主能够增加幸福吗？——基于中国中西部 120 个贫困村 1800 个农户的调查》，《经济学（季刊）》第 2 期。
陈钊 徐彤 刘晓峰，2012：《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

- 《世界经济》第4期。
- 崔红志, 2015: 《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何立新 潘春阳, 2011: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 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管理世界》第8期。
- 何圆 王伊攀, 2015: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研究》第2期。
- 靳小怡 刘妍珺, 2017: 《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连玉君 黎文素 黄必红, 2014: 《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1期。
- 沈可 程令国 魏星, 2013: 《居住模式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 《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 宋璐 李树茁 李亮, 2008: 《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人口与发展》第3期。
- 王海成 郭敏, 2015: 《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政策的合理性》, 《经济学动态》第5期。
- 王萍 李树茁, 2011: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人口研究》第1期。
- 王伟同 魏胜广, 2017: 《员工性别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一个解释》, 《财贸经济》第6期。
- 吴培材, 2018: 《照料孙子女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 肖雅勤, 2017: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 CHARLS 的实证研究》, 《社会保障研究》第1期。
- 尹志超 张诚, 2019: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4期。
- 周晶 韩央迪 Weiyu Mao 等, 2016: 《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 邹红 彭争呈 栾炳江, 2018: 《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 《经济学动态》第7期。
- Arpino, B. & V.Bordone(2014), “Does grandparenting pay off? The effect of child care on grandparents’ cognitive function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2):337-351.
- Chen, F. et al(2011),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Forces* 90(2):571-594.
- Di Gessa, G. et al(2016), “The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health of grandparents in Europe: A lifecourse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52:166-175.
- García-Morán, E. & Z.Kuehn(2017), “With strings attached: Grandparent-provided child care and female labor market outcome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3:80-98.
- Grundy, E.M. et al(2012), “Grandparenting and psychosocial health among older Chilean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Aging & Mental Health* 16(8):1047-1057.
- Hyll, W. & L.Schneider(2013), “The causal effect of watching TV on material aspir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valley of the innoc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6:37-51.

- Karlsou, K.B. et al(2013),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42(2):164-191.
- Leder, S. et al(2007),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Stressors,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outcomes",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13(3):333-352.
- Lee, S. et al(2003), "Caregiving to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3(11):1939-1944.
- Minkler, M. & E.Fuller-Thomson(1999), "The health of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Results of a nation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9):1384-1389.
- Ng, Y.K.(1996), "Happiness surveys: 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1):1-27.
- Poterba, J.M.(2014), "Retirement security in an aging popu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5):1-30.
- Rubin, D.B.(1979),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and regression adjustment to control bias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4(366):318-328.
- Russo, G.(2012),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part-time and full-time workers: The 'identify' approach",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70(3):315-343.
- Sajaia, Z.(2008),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a bivariate ordered probit model: Implementation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Stata Journal* 4(2):1-18.

Raising Grandchildre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Microcosmic Evidenc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WANG Weitong CHEN Li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 entering the aging society,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in 2011, 2013 and 2015,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raising grandchildren on the grandparents' quality of life. We find the behavior of raising grandchildren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grandparents' quality of life, but this effects will be weake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aising intensity and grandpartents' age, the group over 65 years old does not get higher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 sample is restricted to individuals who have grandchildren aged 16 and younger. We also find raising grandchildren canno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grandparents who live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which means that raising left-behind children is not conducive to improving grandparents'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mechanism analysis we find the decrease of loneliness,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children and the increase of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a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 is the decrease of loneliness.

Keywords: Raising Grandchildren; Quality of Life; Raising intensity